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Semiotics of New Tartu School

新塔尔图符号学研究

彭佳 / 著

Semiotics of New Tartu School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塔尔图符号学研究/彭佳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7-220-09904-5

I. ①新… II. ①彭… III. ①符号学-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00331 号

XIN TAERTU FUHAO XUE YANJIU

新塔尔图符号学研究

彭 佳 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版式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陈 欣
张迪茗
戴雨虹
蓝 海
王 俊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 2 号)
<http://www.scpph.com>

E-mail

scrmcbs@sina.com

新浪微博

@ 四川人民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 86259624 86259453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624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208mm

印 张

7.25

字 数

170 千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0-09904-5

定 价

28.00 元

■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目 录

绪 论 新塔尔图学派崛起的背景：西方符号学界的生物学 转向	001
第一章 乌克斯库尔及其主体世界理论	009
第一节 主体世界理论的提出	010
第二节 主体世界理论的哲学范式和结构范式	020
第三节 主体世界理论在当今符号学界的发展和运用	038
第二章 洛特曼的符号学思想及其发展	055
第一节 符号域理论的提出及其生物学渊源	056
第二节 符号域的哲学范式和结构范式	071
第三节 洛特曼符号学思想的生物学渊源及其在生物符号 学领域的发展	085
第三章 皮尔斯为生命符号学及新塔尔图研究开拓的可能	098
第一节 符号的底线：皮尔斯符号学对符号范畴的拓展 ...	099

第二节	皮尔斯的“基础”概念对意义研究和生物符号学的启发	112
第三节	符号与文本的生命性：从皮尔斯到洛特曼的符号学路径	125
第四章	塔尔图生态符号学的发展与现状	140
第一节	生态符号学的发展脉络	141
第二节	卡莱维·库尔提出的“多重自然”模式及其局限性	155
第三节	塔尔图符号学核心概念在生态符号学中的发展 ...	168
第四节	艺术主体世界：对艺术系统的生态符号学考察 ...	189
结 语		212
参考文献		215

新塔尔图学派崛起的背景： 西方符号学界的生物学转向

在世界符号学的广袤版图中，地处东欧的爱沙尼亚可谓是研究重镇之一：曾经的“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名号在符号学界如雷贯耳，洛特曼（Mihhail Lotman）作为这一学派的领军人物，以原创性极高的文艺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理论享誉世界；而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的奠基人乌克斯库尔（Jacob von Uexküll），在塔尔图完成了大量的研究著述，其学术思想被视为当今西方符号学研究的重要基础，不仅在新一代塔尔图学者的学术养成和拓展中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也极大地促成了西方符号学界整体性的生物学转向。这一转向，是“新塔尔图学派”得以发展和建立的首要背景，因此，本文先对此进行简要的论述。

符号学是“意义研究之学”^①，所有对表意和意义的接收、解释模式的研究都应当归于符号学之下。然而，由于符号学缘起于语言学，语言符号是最典型的符号，因此，符号学的研究一直集

^① 胡易容、赵毅衡编：《符号学-传媒学词典》，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7页。

中在对人类语言符号的讨论上。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杰出的美国符号学家西比奥克（Thomas A. Sebeok）提出，应当把动物的表行为行为和相互沟通纳入到符号学的研究中，建立更为广义的符号行为模式和理论，这就是动物符号学（zoosemiotics）的学科构想。西比奥克认为，唯有将动物符号学与对人类符号行为的研究并置，才能更深入和广泛地开拓符号学的疆域。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开始了孜孜不倦的文献追寻工作，以皮尔斯符号学的开放框架为理论背景，希望找到一系列的“隐符号学家”，以此逆向建构广义符号学的史前史。在西比奥克的努力之下，乌克斯库尔的“主体世界”（Umwelt）理论被“重新发现”，乌克斯库尔本人也被视为生物符号学的鼻祖。由于乌克斯库尔提出的符号观和皮尔斯的符号分类在理论上颇有相通之处，符号学界对此表现出极大兴趣。西比奥克也由此宣称，动物和人作为具有神经反应的生命体，都有符号行为，神经活动是符号活动的基本条件，动物的神经反应信号也可以被视为符号，这就为符号的广义化埋下了伏笔。

此看法一经提出，即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以语言文化意义机制研究为关注点、信奉经典符号学的学者们纷纷对西比奥克的观点予以否定。1976 年，著名的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Umberto Eco）划定了符号活动底线的时候，他把人类的语言活动作为最低层面的符号过程，认为信号根本不能算作符号学研究的对象。关于这一点，他的看法直到 2008 年才有了非常明显的转变，愿意承认细胞活动层面的符号过程。艾柯的转变是颇具代表性的：不少当代的符号学家都经历过从狭义的符号学研究转向广义符号学研究的过程。如现今最为著名的意大利生物符号学家巴比耶利

(Marcello Barbieri)，就曾经对生物符号学抱着批评和质疑的看法，到2001年却有了突破性的态度转变，出版了《有机符码：符义生物学的诞生》(*The Organic Codes: The Birth of Semantic Biology*)一书，详尽地讨论了生物符号学的诸多问题。^①2002年，巴比耶利发表了为生物符号学摇旗呐喊的著名论文《生物符号学是否已进入成熟期?》(“Has Biosemiotics Come of Age?”)，并于三年之后，也就是2005年，创立了著名期刊《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为这门学科设立了正式的学术阵地。

普罗迪(Giorgio Prodi)于20世纪70年代初和西比奥克会面之后，就开始致力于生物细胞层面活动的符号学研究，终于在1977年提出，细胞的生命活动应当被视为符号活动。1981年，克兰佩恩(Martin Krampen)建立了植物符号学(phytosemiotics)，将符号活动的主体扩展至植物体。^②索尼耶(Sorin Sonea)于1988年发表了《全球的生命体：对细菌的新看法》(“The Global Organism: A New View of Bacteria”)一文，奠定了细菌符号学研究的基础。^③西比奥克乐见符号学领域的学科拓展，随后将这些研究通通纳入生命符号学的旗帜之下，由此建立了一门范畴宽广、包罗万象的符号学子学科。^④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生命符号学和经典符号学的融合

① Marcello Barbieri. *The Organic Codes: The Birth of Semantic Biology*. Ancona: Pequod, 2001.

② Martin Krampen. “Phytosemiotics.” *Semiotica*, 1981, 36 (3): pp. 187-209.

③ Sorin Sonea. “The Global Organism: a New View of Bacteria.” *The Sciences*, 1988, 28 (4): pp. 38-45.

④ Thomas A. Sebeok, Jean Umiker-Sebeok eds. *Biosemiotic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2.

发展更加深入。塔尔图-莫斯科科学派的新一代领袖库尔（Kalevi Kull）加入了生命符号学的阵营，他发挥自己的生物专业知识，带领塔尔图的学者们对洛特曼和乌克斯库尔的理论传统进行深入研究，对生命符号机制的运行过程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霍夫梅耶（Jesper Hoffmeyer）带领“哥本哈根学派”，整合了免疫学和细胞层面的生物符号学研究。他们提出，生命和符号活动的运行基础是符码之双重性（Code-duality），这一观点成为生命符号学的重要理论基础。^① 克兰佩恩总结了各个层面的符号活动，几乎将所有生命活动都进行了符号学的模式描述和整理。^② 生命符号学协会的成立更是为这一发展趋势推波助澜。巴比耶利写到，“随着第一次大会于哥本哈根举行（官方网站列出来自世界各地六十一位生命符号学家），我们或可公允地说，生命符号学于2001年正式发育完成”^③。2004年，在第四届生命符号学大会期间，几位重要的生命符号学家纷纷放弃了自己对这一学科的称谓，如巴比耶利的生命符义学（biosemantics）、马可斯（Anthon Markoš）的生命阐释学（biohermeneutics），将生命符号学作为这一学科的通称^④，从而结束了学科称谓混乱的情况。生命符号学研究的蔚然成风，使西方符号学界整体性的生物学转向得以完成。

① Jesper Hoffmeyer, Claus Emmeche. “Code-duality and the Semiotics of Nature.” *On Semiotic Modeling*. Myrdene Anderson, Floyd Merrell eds.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1, pp. 117-166.

② Martin Krampen. “Models of Semiosis.” Roland Posner, Klaus Robering, Thomas A. Sebeok eds. *Semiotics: a Handbook on the Sign-theoretic Foundations of Nature and Culture, vol. 1*.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97, pp. 247-287.

③ 玛切诺·巴比耶利著，简瑞碧译：《生命符号学是否已进入成熟期》，《中外文学》2005年第7期，第16页。

④ 玛切诺·巴比耶利著，简瑞碧译：《生命符号学是否已进入成熟期》，《中外文学》2005年第7期，第25页。

在此之后，生命符号学的发展更是在西方学界全面开花。2007年，巴比耶利主编的两本生命符号学论文集得以出版^①，这两本书被不少符号学家列为符号学专业的基本理论读物。迪肯（Terrence Deacon）提出了符号活动与生命起源的模型，开始用意向性的概念来讨论生命符号活动。^②这就为生命符号学与哲学的进一步融合打下了基础。法瓦鲁（Donald Favareau）于2010年主编出版了《生物符号学必读：文集与评论》（*Essential Readings in Biosemiotics: Anthology and Commentary*）^③。塔尔图更是发展出了生命符号学的一大分支，即生态符号学（*ecosemiotics*），旨在通过对自然与文化的符号互动的相互模塑的研究，消除这二者之间的分野。总而言之，生命符号学确实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符号学界的主流思想，符号与符号、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彼此交织成为研究的重点。而伦理符号学作为生命符号学延伸发展的产物，将这种生命符号活动相互交织的图景勾勒得更为清楚。

伦理符号学（*semioethics*）是意大利符号学家庞齐欧（Augusto Ponzio）和佩特里利（Susan Petrilli）所提出的学说。它的理论基础，是将全球的生命活动和符号活动视为一个相互交织的网络，以突显人作为唯一具有符号反思能力的动物，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对所有生命的符号活动应该负有终极责任。这个观

① 这两本论文集分别是 Marcello Barbieri ed. *Biosemiotics: Information, Codes, and Signs in Living Systems*.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2007. 和 Marcello Barbieri ed. *Introduction to Biosemiotics: The New Biological Synthesis*, Dordrecht: Springer, 2007.

② Terrence Deacon. *Incomplete Nature: How Mind Emerged from Matter*,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1991.

③ Donald Favareau ed. *Essential Readings in Biosemiotics: Anthology and Commentary*. Dordrecht: Springer, 2010.

点能够成立，显然得益于生命符号学的迅速发展——否则，符号学的研究范畴尚局限在语言文化之内。然而，究其理论源头，如两位学说创始人所言，一是可以追溯至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建立的“症状学”（*semeiotics*），该学说将症状视为符号，以医者关爱生命的伦理观建构对符号和病症的观察；二是以皮尔斯为代表的广义符号学传统，即被西比奥克称为“大传统”（*major tradition*）、后来发展为总体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的理论学说。其中，与伦理符号学最为相关的，就是西比奥克在生命符号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总体符号学。

2001年，西比奥克出版了《总体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一书，该书是对生命符号学和传统语言文化符号学的大整合。在书中，西比奥克指出，总体符号学所包括的范畴有：1. 所有的生命符号。包括动植物在各个层面的生命活动所使用的符号，以及动物和人类的体内符号活动（*endosemiosis*）中使用的符号。2. 人类文字的和非文字的符号。人类的非文字符号范畴非常宽广，它们包括各类人工语言和肢体语言、聋哑人的语言、婴儿的符号，以及各种人类身体符号。3. 受人类意图影响的、人和其他物种及机器进行交流时产生的符号，以及如同“聪明的汉斯”（*Clever Hans*）案例中所出现的非动物意图的符号。4. 所有的文化艺术符号和学科符号。顾名思义，它覆盖了人类符号学（*anthroposemiotics*）、动物符号学、植物符号学、真菌符号学（*mycosemiotics*）、微观符号学（*microsemiotics*）、机器符号学（*machine semiotics*）、环境符号学（*environmental semiotics*）和体

内符号学的所有研究范畴。^① 由是，符号活动相互联接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网络，而人在这个符号网络中的主体地位，是由伦理符号学来确证和突显的。

2003年，“伦理符号学”一词被正式提出，庞齐欧和佩特里利在同名的专著中提出了这一学说的几个基本观点：第一，符号活动都是对话性的，对话是任何符号活动最为基本的、本体的特征；第二，因此，符号活动一定是他者性的，和他者的相遇是不可避免的；第三，人类作为“符号学动物”（semiotic animals），对所有的符号活动都负有不可推诿的终极责任。^② 2005年，庞齐欧和佩特里利再次推出了一部长篇巨著，即《打开边界的符号学》（*Semiotics Unbounded: Interpretive Routes through the Open Network of Signs*）一书，他们梳理了自皮尔斯以来主要的符号学家对符号和符号活动的讨论，并指出，对话性和他者性在这些讨论中一直是重要的议题，这也就重申了伦理符号学的理论立场。^③ 此学说为生命符号学和总体符号学建构了新的伦理维度，促使人们反思人对其他生命体符号活动的影响。而另一方面，生命符号学理论在塔尔图得以和俄罗斯的形式论相结合，对生态结构、生命意义世界和符号意义生产机制的讨论成为新塔尔图学派的主要议题。它之所以为“新”，是因为它的起点应从1992年塔尔图大学成立专

① Thomas A. Sebeok. *Global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② 该书为意大利文，转引自周劲松：《伦理符号学》，唐小林、祝东主编，《符号学诸领域》，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4-132页。

③ Susan Petrilli, Augusto Ponzio. *Semiotics Unbounded: Interpretive Routes through the Open Network of Sign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5.

门的符号学系算起，而它的主旨可以描述如下^①：

一、符号学被理解为研究所有生命系统，即包括了所有生物物种的符号过程的科学；

二、研究的目标在地理学上有所不同，文化分析中纳入了对文化和生态系统关联性的思考；

三、符号学作为正规的大学学科课程，教授给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库尔认为，两大符号学传统，即始于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和始于乌克斯库尔的生物符号学，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今塔尔图符号学的基础；而皮尔斯的广义符号学与生命符号学的结合，促成了塔尔图符号学的纵深发展。本书即按照“新塔尔图学派”得以建立的学术思想产生的时间脉络，从乌克斯库尔的主体世界理论出发，详细地讨论它与皮尔斯符号学、洛特曼符号学理论相融合的基础，以及在“新塔尔图学派”代表人物，如米哈依·洛特曼、卡莱维·库尔、蒂莫·马伦（Timo Maran）、莫尔顿·托内森（Morten Tonesson）等人的研究中，它们的发展和推进，从而梳理出“新塔尔图学派”的学术体系的形成脉络和重要主张。

^① Kalevi Kull, Silvi Salupere, Peeter Torop. “Semiotics in Estonia.” *Sign Systems Studies*, 2011, 39 (2) .

乌克斯库尔及其主体世界理论

在构筑生物符号学史时，西比奥克指出，出生于爱沙尼亚的德国生物学家乌克斯库尔提出的主体世界概念，为符号学家们讨论生命主体如何将世界对象化、符号化，从而形成自己的意义世界，提供了充足的理论基础，从而使得生物符号学的建立成为可能。西比奥克认为，对于符号（sign）的研究，其发端可以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由希腊医疗之父希波克拉底等人提出的医疗概念，用于判断人的疾病症状——此种概念可被视为“人本符号学”（anthro-semiotics）的最早起源。

但是，在西比奥克看来，更为广义的符号学研究，从动物符号学到生物符号学，甚至总体符号学，才是符号学长远发展的方向，他为此付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在1977年举行的第三届符号学会议上，西比奥克宣读了题目为《乌克斯库尔：一位在符号学史上被忽略的人物》（“Jakob von Uexküll—A Neglected Figure in the History of Semiotics”）的文章，其时，乌克斯库尔的兒子托尔·冯·乌克斯库尔（Thure von Uexküll）正好在会，而后者正不遗余

力地推广其父的理论，两人因而成为好友。此后十余年间，西比奥克和托尔·乌克斯库尔，以及其他生物符号学家，如库尔、弗雷泽（J. T. Fraser）等人，都纷纷发表了讨论主体世界理论的一系列重要论文。乌克斯库尔作为符号学家的地位也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承认。本章将着重介绍作为生命符号学理论基础的主体世界理论，对它与洛特曼的“符号域”（Semiosphere）理论的融合可能进行讨论，并考察它是在当代塔图符号学家的研究中得以发展的。

第一节 主体世界理论的提出

乌克斯库尔于 1864 年出生于爱沙尼亚科布拉斯特庄园的一个传统德国家庭。他的童年时代是在德国的海马尔庄园度过的，在那里，他受到了严格的德式教育，这奠定了他一生对科学孜孜以求的严谨态度。在 19 世纪末的波罗的海各国，德国人在政界和学界都拥有较高地位。乌克斯库尔的父親就曾于 1878 年至 1883 年出任塔林市市长，而乌克斯库尔本人也曾在道斯哥丢勒大学进行学习。自 1884 年起，乌克斯库尔在塔图大学进行了为期五年的学习，师从著名的动物学家马克思·布劳恩（Max Braun）。当时的塔图大学校风较为开明，对先进的生物学研究，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贝尔（Karl Ernst von Baer）的比较胚胎学理论引介甚多。乌克斯库尔有可能从那时起，就已经接触到了这两位学者的著作，而他后来的研究表明，他对前者主要进行的是批判性的思考，而

对后者的学说则是继承性的发展。在塔尔图大学期间，乌克斯库尔已经开始表现出对海洋无脊椎动物的活动进行研究的兴趣；著名的主体世界理论，就是在他长期对无脊椎动物的观察和研究之上提出的。

1889年，乌克斯库尔回到德国，进入了著名的海德堡大学生理学研究所，主要从事对动物肌肉反应的研究。当时的生理学研究所是由屈内（Wihelm Kühne）主持的，屈内对贝尔的推崇态度，可能是乌氏受贝尔影响颇深的原因之一。在此期间，乌氏还在那不勒斯岛的动物研究站工作，从而接触到了发育生物学的理论研究。1905年，他开始讨论动物功能性的身体设计问题，这一讨论为他提出“功能圈”（functional cycle）概念做了初步准备。

1907年，乌克斯库尔获得了海德堡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此后，他开始思考如何采用新的方法论，对生物学进行意义研究的问题。乌克斯库尔认为，达尔文主义者相信的是纯粹的因果关系，认为可以用机械法则来解释生物功能与设计之间的关系——生机论者相信的是生命体的主体设计，认为只有特定的生命体自律，才能解释生物的功能和设计之间的关系——而这两种观点都是不足取的。而机器主义者的方法是调和性的、中间性的，对生命体的设计采取的是主体性的视角，对其功能则是采用机械法则来进行解释，此种方法较为可行。^①事实上，主体世界理论正是对这两种方法的综合，的确是较为接近机器主义者的观点。

以这种视角为基础，乌克斯库尔集中地研究了生命体对所处

^① 该文为德文，转引自 Kalevi Kull. “Jakbo von Uexküll: an Introduction.” *Semiotica*, 2001, 134 (1): pp. 1-59.

环境的主体性认知，以及认知与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此基础上，乌克斯库尔于1909年提出了“主体世界”这个术语，用其描述生命体所拥有的主体性的意义世界。^①该概念认为，主体世界是生命体的感知所覆盖、它自身所创造的世界，这个意义世界是基于符号关系而建立的。由于物种之间的感知器官、方式和范畴不尽相同，在同一个实际世界中，不同的生命体建造出了不同的主体世界。也就是说，它们拥有彼此各异的意义世界。从这里可以看出，乌克斯库尔在建立自己理论体系的初期，就已经考虑到了意义问题，而意义问题正好是符号学的核心问题之一。

十余年之后，1920年，乌克斯库尔出版了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理论生物学》（*Theoretische Biologie*）。在该书中他进一步建构了主体世界理论学说。经由对海洋无脊椎动物和昆虫的观察和研究，乌克斯库尔发现，不同物种的生物有着类似于康德哲学所认为的、内在的意义“先验图示”（Schema），他将其称为“生命体的计划”（plan of organism）。正是这种计划，预设了生命体对世界的不同感知，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主体世界。这一建立在生命机体计划上的主体世界是经由生命体的功能圈机制实现的，它可以分为感知世界（perceptual world, Merkwelt）和行为世界（operational world, Wirkwelt）。

在乌克斯库尔看来，生命体要辨认出外部环境中的对象，首先要经过信号感受器（Rezeptor Merkmalsträger）的符码转换，也就

① 乌氏是在《主体世界与内部世界》（*Umwelt und Innenwelt der Tiere*）一书中提出“Umwelt”一词的，在该书中，他描述了多种无脊椎动物的行为和功能性的身体设计之间的关系。如本文正文所提到的，他在讨论动物的行为和功能时，使用的是不同的理论视角，因此，他的总体视角是综合性的。

是，将对象转化为生命体的内部世界（Innerwelt）可以辨认的信息符号。这个符号进入了生命体的感知世界，由它的感知器官（Merkorgan）感知，并且传达给了行为器官（Wirkorgan），进入了行为世界。在行为世界中，这一对象的符号由行为效应器（Wirkmalträger Effektor）进行了第二次符码转换，从而对对象实施行为。第一次的符号解释行为是辨认性的，感知器官由此做出了判断，并将这条信息（如，异常的超声波）传达给了行为器官。行为器官立即启动了行为效应器，对这一符号信息进行翻译（这种超声波意味着天敌，比如蝙蝠的出现，必须马上逃跑），这是第二次的符号解释行为，它是驱动式的。当生命体完成了这一意义的解释和行为之后，它逃离了危险，并且完成了对象意义的第一次累积，这个完整的功能圈循环得以建立。从此之后，这种意义传递可以在它的功能圈中进行不断的重复和加深，而蝙蝠这一对象变得可以辨认，使其成为它的主体世界，也就是意义世界的一部分。正因为这种预设的有机体设计，也就是不同物种的感知器官和行为器官的特定性，乌克斯库尔指出，生命体的主体世界是各不相同的，它们就好像是由各种无形的关系组成的透明罩子，决定并且构成了经验对象。

在这里必须指出，乌克斯库尔在提出主体世界理论时，充分地考虑到了符号和意义的问题；并且，他持有一个在当时来说相当前沿的观点，认为感知就已经是符号。他将生命体对对象相关特征的感知称作感知符号（Merkmal），把行为效应器发出的、驱动生命体做出反应的符号称作效应符号或行为符号（Wirkmal）。这两个词的词根“-mal”在德文里表示某种标记的行为或结果，